

# 检点汉唐旧梦

——林继中文史论稿

林继中  
著

闽籍学者文丛

第三辑

MINJI XUEZHE WENCONG

林继中 张炯 吴子林 主编

时空寂寞——士大夫忧患意识的诗语言

边塞诗与盛唐心态

试论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

李白歌诗的悲剧精神

“布衣感”新论

由雅入俗：中晚唐文坛大势

文化转型与宋代文学

《翻译杜诗菁华》导读

杜诗《洗兵马》钱注发微

# 检点汉唐旧梦

——林继中文史论稿

林继中 著

闽籍学者文丛 第三辑

闽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检点汉唐旧梦：林继中文史论稿 / 林继中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22.9

(闽籍学者文丛. 第三辑)

ISBN 978-7-211-08927-7

I. ①检… II. ①林…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169823 号

## 检点汉唐旧梦

JIANDIAN HANTANG JIUMENG

——林继中文史论稿

---

丛书主编：林继中 张 炯 吴子林

作 者：林继中

责任编辑：林俊杰

出版发行：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mailto:fjpph7211@126.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金山浦上工业区 B 区 42 幢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20.25

字 数：278 千字

版 次：2022 年 9 月第 1 版

202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8927-7

定 价：52.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总 序

本丛书为闽籍知名学者的学术论著精选集。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海隅，南临大海，有一条美丽绵长的海岸线，让人联想起一种开放性，其北为武夷山脉等群山所隔，又略显局促、逼仄。地理位置的这种矛盾性特点，一方面，使闽地学者不安于空间狭小的故园，历经磨难而游学四方，冲出“边缘”进入“中心”；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与“中心”相疏离的“外省”特色，在“中心”与“边缘”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这有力地塑造了闽地文化独特的“精神气候”：有比较开阔的世界性视野，善于借助异域文化经验、文化优势来实现自己、完成自己，建构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话语，占据着学术思想的高地。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文化渐次南移，尤以唐宋为甚，故闽地学人辈出不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期，福州、厦门被列入“五口”开放，西学进入沿海城市，闽地涌现许多文化先驱，一度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如“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严复，译介域外小说的林纾，等等。此后，闽地文化人如鲍照诗所云“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以其才智和气魄在激烈竞争中居于重要地位。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又一转型期，闽地文化人再次异军突起、风云际会，主动发起、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坛数次

意义重大的论战，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大大深化了80年代以降的文学变革和思想启蒙，成为学界思想潮流的尖兵。为此，当代著名作家王蒙提出了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京派”“海派”“闽派”三足鼎立之说。这对于一个文化边缘省份而言，既是悠久历史传统的复苏，也是未来文化前景的预期，既是一项殊荣，也是一种鼓舞。

当代学术中“闽派”的提法，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这个以地域命名的学术群落，散布全国各地学术重镇，每个人的文化素养、价值观念、审美向度和言述方式大相径庭，但都在全国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力，充分展现了八闽大地包容万象的气势。职是之故，我们不拘于一“派”之囿，以“闽籍学者”定位这一丰富的文化现象。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受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我们欣然编选、推出“闽籍学者文丛”。闽籍学者阵容强大，我们分期分批分人结集出版，一方面是检阅闽地学人的学术实绩，另一方面则志在薪梓承传，泽被后学。

这是“闽籍学者文丛”第三辑。第一辑入选的著者有谢冕、张炯、童庆炳、孙绍振、程正民、陈仲义、陈晓明、林丹娅、吴子林、黄发有，第二辑入选的著者有郑敏、陈骏涛、刘登翰、林兴宅、俞兆平、曾镇南、王光明、南帆、李朝全、谢有顺。与前两辑一样，本辑推出的同样是我国当代文坛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既有年逾九旬的老学者，也有中青年学术新锐；每人一集，收录“有分量”的代表性论文，凸显“一家之言”的戛戛独造。这些闽籍学者都有学术体系的内在经纬，都有思想体系的结构支点，都有话语体系的文体风格；他们的每一个作品都是一次旅行，一个生命在构成理念的言语活动中的旅程；作为一个生成事件，他们的写作

永远没有结束，永远在进行之中……

我们深信，“闽派批评”的后来者，只要坚持文化创新的理念，赓续“闽派批评”的精神品格，在“中心”与“边缘”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定能如20世纪“闽派批评”的先行者一样，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不忘初心，锐意进取，成为新时代名副其实的文化先锋或“引擎”，给当代文坛持续提供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贡献出自己所有的聪明才智。

“闽籍学者文丛”第三辑得到了闽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专项经费资助，福建人民出版社付出了诸多心力，在此一并致谢！正是源于大家的齐心协力，“闽籍学者文丛”第三辑才得以顺利出版。

是为序。

# 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代序）

——林继中先生访谈录

李圣传 整理

## 一、转益多师：路漫漫而上下求索

李圣传（以下简称“李”）：林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抽空接受我的访谈。我们先从您的求学经历谈起。您从小生长于医生家庭，后来为什么会喜欢上文学，并走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道路呢？

林继中（以下简称“林”）：我从小喜欢唐诗、小说，爱好听故事。中学时代，鲁迅的小说、杂文我几乎都读过。其他如当时流行的《林海雪原》、俄罗斯文学、裴多菲以及海涅的作品，等等，我都喜欢读。因此，我是慢慢地走上了文学研究的道路。

李：听说您大学毕业后有一段特殊的经历，就是被安排到军垦农场劳动，后来又进深山教中学，并在这段异常艰苦的岁月中通读了《明史》等大量历史文献。这对您此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林：“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福建师院（今为福建师大）读本科，后期是“逍遥派”，静心读书。当时，毛主席号召说要多读历史。其实我之前也一直在读马恩的书籍，恩格斯《反杜林论》《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我尤其喜欢。1972年前后的几年，我在福建华安县组织组当过材料员，还当过政工，带民工修过铁路，这些都离文学非常遥远，却让我更深地了解了社会，对文学研究很有帮助。

李：1978年，您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师从周祖谟先生攻读唐代文学。因“文化大革命”沉寂十多年，您当时的学术心态和志向如何？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浦江清先生的弟子，周祖谟先生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又给了您怎样的学术训练？

林：当时，因“文化大革命”，觉得古典文学相对离政治稍微远些，兴许以后也会“保险”些，所以选择走这条路。（笑）其实，我读本科时喜欢的是写散文和新诗之类。硕士期间，导师每周上一次课，采取“沙龙”的形式，主要是我们谈读书的心得体会，然后导师穿插点拨。周先生主要强调和布置我们读历史，《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必须在短时间内读完指定部分，工作量很大。尤其是《资治通鉴》“隋唐五代”段，必须做到熟悉，而《新唐书》《旧唐书》则重点看一部分“列传”“表”“志”等文献，强调要熟悉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我当时还听了著名史学家厦门大学韩国磐先生的课，他是隋唐五代史方面的专家，侧重政治经济学。我当时选择研究王维，就是专门从庄园经济的角度去解读王维。其实，文史不分家，郑朝宗先生也是“清华派”，外文非常好，对西方文学也很通，但也重视文献实证。受郑、周两位先生中西合璧思想的影响，我自己的研究道路也是一面抓文献古籍，注重考据、义理、辞章，一面读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及西方文论，注重中西互证。“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嘛，“文化自觉”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认识，还要将民族文化置于全人类文化里面，多元统一。正所谓“各美其美，美其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想：这种中西融合的心态，会慢慢成为社会的主流。

李：林先生，您硕士毕业后，1983年又考入山东大学师从萧涤非先生攻读唐宋文学博士学位，与莫砺锋、王富仁等先生一起成为新中国首批文学博士。您能否简要回忆当时的读书情形并谈谈萧涤非先生指导博士学位论文的方法？

林：像林语堂一样，闽南人都有思乡情结。我硕士毕业后先是返乡到师专任教，然后再考入山东大学。导师萧涤非先生重视“实地考察”。王国维主张“二重证据法”，而萧先生还注重实地查证与体验，他受鲁迅、毛泽东的影响比较深。他搞杜诗研究的一大发明就是：组织“杜甫组”先“万里行”，沿着杜甫的足迹走一遍，在“实地感悟”中“感悟杜甫”。这可谓“三重法”，即：地面上的文献、地下的文献以及现实中活的文献。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也是导师给的，目的是强化我的基础训练。

李：您由萧涤非先生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共计一百多万言，获程千帆、陈贻焮等学界巨擘大力推崇，并被列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从史料搜集，到辑佚校勘，再到运思写作，您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林：我的体会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这不是很难的事情，关键是要细心，冷板凳要坐得住。这种“考镜源流”的工作与其他理论式的研究不同，做得好不好，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你是不是学术天才，而是你细心不细心、认真不认真。考镜源流、追查出典、核实原文，大量工作都不是体现在“出校”上，因为核对以后如果原文没错，就一点也体现不出你的劳动。我写几条几条校正，那是因为他出错了，这才有痕迹表现出来。但绝大部分都是你查对以后没痕迹表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每天花的时间很多、很辛苦，冬天最好计算，一直要等到整个窗户都结满了冰花、都白了，才去睡觉，大概要到晚上两点多吧。第二天早上七点多又

要起床，读读外语。当时也就是在宿舍、食堂、资料室“三点一线”地跑。这种工作不用经常去麻烦导师，因导师年纪大了。但萧先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常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组织“杜甫组”时，学校和各出版社均大力支持，当时各单位图书资料封锁还很厉害，但凭借萧先生的声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助以及山东大学自身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学术资源，当时从全国各个地方弄来了200多种版本的杜诗杜注。这样我就至少省掉了十年的学术准备工作，因为在那个时代，你个人根本不可能找来那么齐全的资料。比如说赵次公的注本，我也是从资料室才看到的，而这个注本也是从北京图书馆复印过来的，其他人怎么可能看到呢？

李：听说您博士论文答辩时带来的笔记材料堆得有1米多高，把整个人都挡住了。能否回忆一下您当时答辩的情景？

林：（笑）一两尺高吧，全是一些复印稿，我的那些材料和博士论文原稿都留在了山东大学图书馆，我自己也没有。其实，这也只是证明“笨功夫”下得够，不能证明其他什么。研究古典文学就是要历史打底，加上“坐功”。大概因受先后两位导师的影响，传统中最基本的东西在我的论文中都有体现：一个“史”，一个“证”。可能在收集材料的功夫上还欠缺一些。

## 二、诗国观潮：“文献实证”与“中西合璧”

李：林先生，您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但在您此后的著作中（比如《诗国观潮》），除“考据、义理、辞章”外，还大量运用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以及接受美学等西方理论。您认为，运用这些“西

方理论模式”来烛照剖析唐宋诗歌现象时，其意义价值在哪里？

林：我认为中国文化的精义在于“道法自然”。正所谓“物无非天也。天也者，自然者也”。我对文论虽然没有专门性研究，但对钱钟书的《管锥编》《谈艺录》还是认真研读过的。此外，当时厦门大学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理论上的“得风气之先”。所以，当时厦门大学能出刘再复、林兴宅等理论家是有道理的。那时台湾的书还很难在大陆流通，但在厦大却有很多，叶维廉的书啊，钱穆的书啊，等等，还专门设有台湾研究所。当时舒婷等人在那段时间也刚好“崛起”，所以“新风气”就蔓延整个厦门。我也在那种氛围中阅读了叶维廉等人的许多新理论。受这些理论新风的影响，我也就较为容易用西方理论来烛照、激活古典文学。包括后来我还看了许多日本的书，因我读硕士时就跟日本学者入谷仙介通信，他还送了我一本《王维研究》。我当时学日语，读了些日本书籍。我的文论也较杂糅，加上过去的爱好以及郑先生“钱钟书研究”的指导影响，我的研究路子也就基本定调了。可以说，我的研究始终是中西“双修”的，我并不刻意为了研究而去学习西方理论，而是“中学—西学”比较的思维。它的意义无非是拓宽视野，减少偏执。

李：在《情感意象的一种构图方式》一文中，您正是运用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一书中关于“感性的意味”与“诗的形式”等观点从情感结构角度对杜诗“碧瓦初寒外”“香稻啄余鹦鹉粒”等诸种不可表达之“物”与“图形”进行了生动诠释。但是，中学与西学毕竟文化土壤不同，因而才产生诸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之辩。那么，就唐宋诗歌而言，在引进“西方理论模式”进行阐释激活时，为防止过度阐释或文本误读，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林：这个我觉得应该向鲁迅的“韧”的精神学习。也就是说，很多事情都不要想一次性解决，真理可以无限逼近，但永远不可能

到达其终点。很多东西不可能完美，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追求美满作为一种目的可以，但是你要明白它永远是有缺陷的。理论与实践一定要“同步共振”，边实践边得出结论，结论再回实践，实践检验后再产生并修正理论，二者交流电似的几乎同时发生、发展。就像结构主义引出后结构主义一样，这并非“后浪推前浪”，而是像我说过的“蔓状生长”。这是一种“生态的关系”。我们当代人老是喜欢用一种物理性思维去解释文论，这就很容易机械化。实际上，中西学的问题不要去考究谁为“体”谁为“用”，“体”与“用”是相关联的，牛的“体”、牛的四肢就是为牛服务的，而马的体、马的四肢只是为马服务，这两个绝不能分开。因此，我们还得回到原点——“太极图”。“阴”和“阳”是“一”，“一”分为“二”不是“真分”，“阴在阳内”，只是互动，在相互转化的过程中相互促成。中与西其实也是“一”：同属人类。所以我认为要把人类看为一体。中国最古老的东西是最现代的，分析、归纳到极点，就回到了原点。回到原点不是回到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是回到东方的老子、孔子。东西方文化都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财产，所以回到原点不一定西欧就必须回到西欧，也可以回到东方。同理，我们将来发展到一定程度，说不定也回到印度去啦，这些东西都说不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嘛。人类思想总在不断发展、不断交汇。所以，我常说“道法自然”，自然的本质就是多元统一的，“杂”就是一种多元、一种常态。当然，多元到和谐、融一，还要长期磨合，误读之类难免。

李：林先生，在您的治学方法中，“文献实证”与“以大观小”是非常重要的两极。“文献实证”倾向于微观的史料与考证，讲究“考据、义理、辞章”，而“以大观小”则注重宏观的文化考察。您常强调将研究对象置于大的历史文化场景中，再通过文本的文献学考察，进而做到在“以大观小”中又“小中见大”。您能否简要

谈谈？

林：我的导师周祖谟先生的书架上有一套闻一多的书，我看到后也买了一套。我觉得这个问题和前面讲的差不多，“阴”和“阳”是“一”，这个问题也是“一”。闻一多先生就是这么做的。他的考证跟古人很不一样，虽然在文献、出土文物的考证上也一样，但“统帅”却换了，他的推理思维是非常现代的。他将之融会到文化语境中去。比如说对《芣苢》的考证，闻一多以传注训诂之学与民俗学、神话学、社会学相结合，辨明了芣苢的象征意义，以及以现代人的妇女观观照那个时代妇女在生育问题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闻一多这种以现代学术意识为主导，将传注训诂纳入文化大视野，赋予它以多维度的文化阐释功能，使“考据、义理、辞章”的旧框架发生了范式性变革，激活了这门古老的传统学科。这种文献实证与文化考察的结合，不仅将训诂学从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释放出空前的能量，还在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中既恢复了语境和诗意，并将之融入了现代学术。这就是一种自觉的“中国文化诗学”。闻一多先生的研究路径绝妙地演示并解决了这些问题——将对象置诸文化场域的整体性语境中去考察研讨，这就是“文献实证”和“以大观小”的统一。

### 三、文学史观：“蔓状生长”与“文化建构”

李：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您开始酝酿写作《文化建构文学史纲》，1993年出版了中唐到北宋部分（海峡文艺出版社），接着2005年又补充出版了魏晋到盛唐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

书出版后颇得学界好评，您能否谈谈这本书的写作初衷以及您希望达到的文学史目的？

林：我在写赵次公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地将各种材料放在一起，后来写作四万多字的博士论文前言，其中一部分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当时我就从材料中感受到：就像“文化迁徙”一样，文学价值与意义也是在流动中或升或降。受时代影响，我又开始看姚斯的接受美学，我后来的研究视角也是从接受美学入手，但底子还是“文化模式”论，主要是受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两书影响。我当时就想将布克哈特与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模式引入文学研究中。因为我预感到：就像闻一多的研究一样，“文化模式”也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杜甫不管成就再大，将他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只是一点，而将之放诸人类文化史上则更是一点，这就是所谓的“以大观小”，而我就是想要将这种动态关系呈现出来。我是1983年考取山东大学文学博士的，1985年我的博士论文就已完稿，但因导师萧涤非先生生病住院，我只能推迟答辩。这段时间我除了将博士论文反复校对、修改外，还开始收集材料，主要是北宋，因为唐代部分我读硕士课程时已经下过功夫了。当时单篇文章也已经写作出来，但我觉得单篇文章还说不清楚，于是决定写作一本书，中唐至北宋部分大概一年多就写完了。当时书的出版比较难，直到1993年才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初衷也不过是换个角度认识一下文学史而已。

李：您从“文化模式”角度去思考文学史的动态建构，除受布克哈特、本尼迪克特以及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外，是否还与当时“文化热”的时代学术氛围有一定的关联？

林：当时“文化研究热”已经引起人家反感了，你看南京大学张宏生先生当时对我这本书的评论就知道了。文章中提到当时有学者就和他谈“谁要是再同他谈文化，他就和谁拼命”，因为“文化”

二字已经被炒得令人大倒胃口，以至于在公众中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从主观上说，我的书与当时的文化研究热潮没有必然关联。我的研究主要来自于自己的兴趣以及长期探索与实践。

李：在撰写中国文学史时，从时限说，学界一般都是写通史或断代史，但您书中却是以“魏晋—盛唐”以及“中唐—北宋”这一逻辑脉络与界限去书写，这种划分的理据是什么？

林：叶燮在《已畦集》卷八《百家唐诗序》就指出：贞元、元和之际，后人称诗，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也说，“唐宋时期”一词从学术上说“有更改的必要”，并指出“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中唐是整个大历史的分界线，我们现在继承的主要是宋明理学的影响，而前面的汉唐却很生疏。事实上，汉唐、南北朝的多元文化，与后半段历史的文化心态不一样，特别是南宋以后受侵略的逆反心理，文化心理结构起了很大的变化。这些都是我“文化建构文学史”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当年，葛兆光、陈伯海诸先生都嫌我的书名“涩”，但我没改（笑）。到现在，已经很多人都在谈“文化建构”啦。其实，重点就在“建构”两个字，“文化—文学”不是“两张皮”，而是“太极”，相互轮转驱动。文化变了，文学不能不变，而文学变了反过来也会影响文化的变化。因此，“文化—文学”是“双向建构”的关系。至于分期问题，如何“切”（划分依据），我也是从宏观入手，“以大观小”，从矛盾最大的地方切入，一边是“盛唐”，一边是“中唐”；前面是“前不见古人”，后面是“后不见来者”。而我就紧紧抓住这个“交界点”，其实什么事情都是一样，一定要把握住节点。

李：对，所以您在《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以及《文学史新视野》中，反复提到两个关键词，即“蔓状生长”与“文化建构”。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关注“突变”与“交叉”的部分。您能否进一

步谈谈其中所包孕的文化哲理？

林：这在物理学家普里高津那里说得很清楚：我们的时代是各种理念与方法相互冲突的时代，这些理念与方法各自经历了长期相互隔绝的发展过程之后，突然遭遇，便产生蔚为大观的进展。其实，浪花最精彩的，就是当洪水遇到石头，相撞的那一刹那。为什么民国、南北朝在文学史上会异常精彩？这就是正处于“变”与“不变”之间。民族转型的“十字路口”，就好比日本的明治维新，直接决定着未来走向。花将开未开，美就在于“富于包孕的那一顷刻”。

李：我在读您《文化建构文学史纲》的时候，发现其核心骨架其实就是两种“文化构型”的嬗变，即“士族地主文化”与“世俗地主文化”构型，并在这两种文化构型的内在驱动与递变中审视文学的生产机制。您这种“文化建构文学史”的视角或许更强调“文化”的中介作用，但文学史的发展除“文化建构”的驱动构型外，还有其自身独特的内部发展规律，您是如何处理的？

林：文学的内部规律就表现在“质”与“文”、“雅”与“俗”的关系上，《文心雕龙·通变》也提到“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櫟括乎雅俗之际”，这就是文学通变的内部规律。我书中也提到了文化构型中“由雅入俗”和“化俗为雅”的文学史嬗变规律。

李：对，您书中指出，北宋年间的文坛大势是“由雅入俗”，其表征一是重叙事，二是重感官；您还意识到了另一条“化俗为雅”的螺旋过程：一是以苏轼为代表将“感情走私”的词改造为与诗一样的“言志”之具；一是以周邦彦为代表，偏重将“俗腔”改造成“雅调”。您认为古代文人在文学“雅俗”观念的精神态度上与今人有何异同？

林：北宋文坛大势应该是“化俗为雅”。至于古今异同，我过去也常和学生开玩笑说，我们当代人来研究古代中国是很幸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本上思维没变。西方的今人要感悟古人很难，

但我们中国不难，基本上没怎么变。朝鲜也一样，老子传儿子天公地道，现代中国人也基本能接受。现在复兴得最厉害的“最当代的古代”就是族谱。所以说，我们距古不远。这是一种落后的表现，但对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来说是很便利的，变化不是很大。所以我常说，要借西方的水来反复冲洗我们的传统思维，积淀太深、太丰富了，需要“减肥”一下。我们心里头需要装着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视野，正如王国维先生在《国学丛刊序》中所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王国维那么早就说西方不可能单独前进，东方没有西方也不可能独自发展，我们连王国维的脚后跟都望尘莫及。很多原点不必企望太远，回到民国那些大师就可以。我的“文化建构文学史纲”其实就是回到陈寅恪那里，因为“士族”“庶族”就是他说的，但是我将“庶族”改为“世俗地主”，因为“士族”没了，你还有什么“庶族”，对吧？

李：对。您《文化建构文学史纲》写“魏晋—北宋”，但其实魏晋与唐宋在文艺特征及美学艺术风格上有着显著的变化。如：钟嵘《诗品》与刘勰《文心雕龙》侧重讲文艺的特征和创作规律、讲“神与物游”、讲人格理想的树立；但到司空图《诗品》与严羽《沧浪诗话》则更进一层，讲艺术作品的审美风尚和意境、讲“思与境偕”、注重人生态度的追求。这种文学艺术内部的变迁从“文化建构文学史”的角度，该怎样解释？

林：我认为没有纯粹的文学的内部规律，因为形式是依内容而存在的，内容也是依附于形式，没有没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没内容的形式，形式与内容是相互依存无法分割的。从文学规律来说，从“兴象”慢慢发展过渡到“韵味”，这中间的“催化剂”就是禅宗，没有禅宗是不会有这样的变化。禅宗本身虽不参与反应，但它促成